

我国古代在生物起源和进化 问题上的儒法斗争

甄朔南 张 锋

(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地球上千差万别的生物是怎么来的?生物是否永远一个样子?它们会不会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回答。

今天,当你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看到那粒壮穗满的五谷、丰盛的蔬菜、瓜果和膘肥体壮的家畜;或者劳动之余来到公园里观赏那群芳斗艳的百花,五光十色的金鱼时,你一定会为我国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卓越的智慧而感到自豪,同时对于上面的问题,你一定会回答说:这是自然界进化和人类有意识地选择、培育的结果。

然而,在生物进化的问题上,几千年来始终贯穿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虽然真正成体系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在十九世纪初才形成,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已积累了大量关于生物遗传、变异和选择、育种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具有进化思想萌芽的法家的朴素唯物论与儒家唯心的神创论、目的论、物种不变论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总是与当时的革命和复辟、进步和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单纯的学术之争。过去有个别的生物学家认为“中国古代学者的宇宙观,并没有物种不变神创的看法”,通过对儒法斗争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

我们知道,原始人类是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的,他们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植物的果实、根茎、鱼类和猎物为主。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在食物方面摆脱了自然界的羁绊,运用选择的方法来栽植、耕种和改良可食的植物和驯养家畜,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对生物的特性和生长规律积累了初步知识。但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对于旱、涝、虫、雹等自然灾害往往无能为力,因此产生了超自然力的信仰,出现了种种神话和迷信。进入奴隶社会后,随着奴隶反抗压迫的斗争的日趋激烈,奴隶主阶级就需要寻找一种思想工具,束缚奴隶的手脚。他们利用了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知,把“天”说成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神或上帝,奉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去愚弄人民,以维护其反动统治。

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这个问题第一次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由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推动,殷周时代的劳动人民中已出现了科学思想的萌芽,不断地提出了“天不可信”的观点。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朴素的唯物的“五行”说,把世界看作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的,而和奴隶主宣扬的“天命”毫不相干。例如,在《诗经》中

的《大雅·瞻印》中就对天命公开地进行谴责：“我抬起头来仰望苍天，老天爷，你对我没有一点恩惠。”《小雅·十月之交》中说：“下民如今活受罪，罪孽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直接地否定了所谓自然界万物的创造者——“天”的存在。

二

春秋时期的孔老是系统地鼓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祖师爷。他顽固地继承殷周统治阶级的天命观，叫喊道：“巍巍乎，唯天为大”，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就把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转，地球上的人类、生物和其它无机物的出现，都说成是冥冥中的老天爷的意志的体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在孔老二看来，不仅上帝造万物，而且生死祸福都由上帝安排好了，因此，他要奴隶们“畏天命”（《论语·季氏》），听凭奴隶主贵族的压迫、剥削而不准起来造反，把天命视为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据。

一天，这个自称“知天命”的孔老二病倒了，他自己和弟子们日夜为之祈祷，可是仍然病魔缠身，以致他无可奈何地哀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第二》）老天爷对这位“圣人”的一点小病都丝毫不想点办法解救，这真是对鼓吹天命观者的一个莫大的嘲弄。

后来的子思、孟轲又把孔丘的天命观加以发展，提出什么“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意思是说掌握了中庸之道的孔丘这样的“圣人”，能使万物生长、发育、繁盛。又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就是说，天地间是没有矛盾、对立（“不贰”）的，因此它生育万物也就不可测知，人类只能听凭造物主的任意摆布，这是一种典型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是为复辟奴隶制度，反对变革直接服务的。

与此相反，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哲学上和在政治上一样，都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气息的。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都把生物界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看成是物质的，他们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五行”说的思想。《管子》一书中的《水地》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把水看成是万物的根源和基础，世间一切生物的发生和成长都离不开它。草木、鸟兽得了水就滋长、繁盛，“水”的最精华部分凝集起来就形成了人。虽然他把物质和物质的特殊形态混为一谈，但却包含了朴素唯物论的思想。

战国末年，法家荀况是反对儒家天命观、神创论的杰出代表。他认为：“天地生之本”，即物质世界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他在《天论》中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即认为包括生物在内的万物，各自得到相适应的各种自然条件而产生，各自得到所需要的滋养而成长。这就给神造万物以直接的否定。他还说过：水火是物质的气形成的，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无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无伦理道德；人类则有气、有生命、知觉，而且有伦理道德，“故最为天下贵也”，说明荀况已认识到从无机界到有机界（植物界、动物界）以至人类的逐步过渡与其间的本质的区别，然而它们都是统一由物质（即所谓“气”）组成的。更可贵的是他还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改造自然的口号，明确地提出：与其顺从天而赞美它，何不掌握它的变化规律去利用它呢？他的学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发展了荀况的思想。他说：“夫物一存一亡，乍生乍死，初盛而衰者，不可谓常”，这就是说，一切事物的存亡、生死、盛衰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三

进入封建社会后，儒家站在维护反动封建统治的立场，继续鼓吹反动的天命观。神创论和目的论在两汉时期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臭名昭著的董仲舒。他大肆鼓吹“天生万物”的说教，说什么“天者万物之主，万物非天不生”，甚至胡说“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又说上帝造万物时，“派给了牙齿的就不再给角；派给了翅膀的就只给两只脚”，这真是千古奇谈。恐龙中的角龙，哺乳动物中的鹿、牛、羊、犀、雷兽等都有角，虽然牙齿不象肉食类那样尖利，但总是有牙齿，而且牙齿在演化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分类学上鉴定种属的主要依据之一。介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始祖鸟，在它的翅膀前端就还保留着爪，因此，它既有翅膀，又有四只脚，是一种“用四肢行走的鸟”（《反杜林论》）。所以，董仲舒的上述谬论是一种标准的目的论的说教。恩格斯在批判这种反动论点时深刻指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自然辩证法》）这不也同样打中了董仲舒上述谬论的要害吗？至于董仲舒为了给“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硬说因为一年有了366天，人体才有366块骨头，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才有四肢等等的“天人感应”的说教，就更是荒诞透顶了。

董仲舒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和唯心论的神创论，受到了汉代著名法家王充的尖锐批判。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有一种说法以为天生出五谷就是给人吃的，生出丝来就是给人穿的，说天充当农民和桑女，这种说法不符合自然的道理，所以值得怀疑，不能信以为真”。事实上，五谷和丝麻是人类对动、植物长期定向培育、驯化的结果，并非上帝的赐予。王充用植物的叶脉，鸟兽的羽毛，春天生物的生长和秋天植物的成熟，说明生物不可能是上帝造出来的，“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如果是上帝造的，要用手来创造，哪里有万万千千的双手去创造无数的生物呢？这对神创论的批判是何等铿锵有力！

贾思勰是北魏末叶（公元六世纪）一位具有鲜明的法家思想倾向的农业科学家。他曾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实践，他所写的《齐民要术》广泛综合了我国劳动人民对农作物和家畜的遗传性、变异性、人工选择及定向培育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如书中说，果树嫁接时用上部分叉枝条做接穗比用近根部的小枝作接穗，结实要早。还讲到了马与驴杂交发育成的骡，超过双亲，即杂种优势的问题。这些大量记述，是对孔孟之徒的神创论和目的论的最有力的驳斥，为以后十九世纪生物进化学说的建立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难怪达尔文在他写《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两部巨著时参考了《齐民要术》，并写道：“我看到一本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清楚地记载着选择原理”。

唐代的柳宗元在《天对》中提出了元气说，用物质的元气否认了神创论，并且认为，地球上的植物并不是上帝有目的、有意识创造出来的，瓜果树木也不是由上帝有意造出来给昆虫吃的，这正刺中了目的论的要害。

宋代以后，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化，儒家也更走向反动，儒法两家在生物进化问题上的斗争尤为激烈。北宋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法家沈括，一生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活动，由于他比较注意向劳动人民学习，重视生产

实践和科学实验,因此能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这就明确地指出了万物不仅会变,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走南闯北,为推行新法激流勇进。他从河北太行山地层中发现的螺蚌壳,科学地推论了海陆变迁。从延安一带地下发掘出来的新芦木化石,推测古今气候的不同。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今天我们使用的“化石”这个名称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最早使用这个名称时,把从地球中发掘出来的任何东西(包括各种矿物和岩石)都叫做化石。欧洲人把化石作为沧海桑田的证据的是从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1452-1519)开始的,而沈括比他们在化石方面的论述还要早四百年。沈括把化石看做是生物的遗体,应用它推断古地理、古气候,这是对腐儒俗子们鼓吹的神创论最直接、最有力的鞭挞和谴责!

自称是孔丘继承人的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鼓吹一切生物、人类和“三纲五常”都是由“天理”派生的。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卷1》)朱熹歪曲关于螺蚌壳的科学事实,利用它做为宣扬灾变论的理论根据,胡说什么天地每隔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发生一次大灾变,而这每一次重复的创造行动又是上帝指使的。儒家不顾生物进化的客观事实,为维护反动封建统治效劳的丑恶行径,在此确是暴露无遗了。朱熹还说:“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朱子语类,卷1》)这是否定一切变异的形而上学观点。

朱熹的反动理学受到历代劳动人民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冲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李时珍经历了地主阶级顽固派推行儒家路线和明朝中叶法家代表人物张居正执政的两个历史时期,张居正批判儒家复古倒退的种种邪说,对李时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李时珍从法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武器,比如他把金、木、水、火、土作为五种物质元素来看待,是受了王安石等人的著作的影响。另外,他通过自己的科学实验以及他那个时代科学的进展,大胆地批判腐儒们的迂谈,例如孔丘本来不懂植物学,当有人拿来一种植物请他定名时,他胡诌了一个“萍实”的名称,以显示他的“博学”。但是李时珍却在《本草纲目》中加以纠正,指出那种植物实际上叫“萍蓬草”,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孔老二。李时珍早年毅然放弃科举的道路,毕生从医,进山采药,亲尝百草,总结我国十六世纪以前劳动人民宝贵的实践经验,写成了《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已经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他对药物的分类,不是抄袭前人的上、中、下的三品分类法,而是以生物进化的历程进行系统分类,初步地描绘了一个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路线。这种科学的分类方法,比林奈早二百年。林奈是一个物种不变论者,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却记载了金鱼的变异、野象的驯化等生物具有变异性的事实。而且他把动物分成虫、鳞、介、禽、兽、人六部,把猿、猴列入兽部寓怪类,并指出它们与人类相似的地方,看成是高等动物。虽然今天看来这种分类法有很大的缺陷,但基本上体现了生物进化的观念。在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记载了不少化石,像石燕、石蟹、龙骨、植物化石等等,都较前人有进一步的论述,并且他第一次记载了粪化石。当李时珍已经认识到动物的粪便可以形成化石时,而欧洲的主张神创论的资产阶级学者和贵妇人还把粪化石当作牛宝石而在人们中炫耀,这真是绝大的讽刺!

四

我国从很早的古代起，就有发达的文明和位于世界先列的农业。这正是我国古代很早即具有生物进化思想萌芽的原因。“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只有从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以及反映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儒法斗争中，才能找到正确理解我国古代生物进化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钥匙。而对于周围生物界不断进行着改造的，正是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他们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主人。

在生物起源和进化问题上，儒法两家坚持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前者主张天造万物，物种不变，因此只能听天由命；后者则主张生物界是物质的、可变的，相信人定胜天。法家之所以能提出关于生物发展的朴素的唯物论观点，是由于它重视实践，主张耕战，能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并且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坚持前进、变革；而反动的儒家则轻视实践，视生产技艺为“鄙事”，斥责从事生产劳动的是“小人”，鼓吹复辟倒退，以推行其“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并使我国人民中处于萌芽状态的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遭到扼杀和摧残，以致在以后使我国的生物科学反而处于落后状态。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却宣扬什么“儒家是我国文化的来源”，对于这种反动观点，必须彻底批判。

由于不同的立场，沈括与朱熹同样看到了螺蚌壳，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个承认地球万物是运动的、变化的，一个宣扬灾变论。这最生动地说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上述法家人物和进步科学家仍不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著作中仍掺杂了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只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可能对于生物起源和进化问题作出完全科学的、唯物的解释。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再一次向我们指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历史任务。“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了在科学研究领域内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一切自然科学工作者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自己。为此，总结我国古代在生物起源和进化问题上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十分有益的。